

敕勒川地区姓名演变史中蕴含的共同体意识

□ 高景哲

姓名，大多寄意着某种人生愿景，是起名者的一种心理反映。通过探讨取名行为，我们可以从中窥视出某一个时代的群体性意识。如20世纪50~70年代生人，取名建国、建军、志军、跃进、卫国、卫民、国庆、振华者较为普遍，反映了那时人们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激情。下面就土右旗各族人民自明代以来的姓名演变规律试做探讨，并揭示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

一、汉族取蒙古语名字

明朝中后期，土默特部领主阿勒坦汗为减轻游牧经济单一性带来的生存困扰，而大力吸纳内地汉族流民。据《万历武功录》记载，从明嘉靖初年到隆庆议和20多年里，迁移到丰州滩（土默川）的汉族人口总计有5万余人，其中白

莲教徒1万余人。汉族移民在土默川上开田万顷，建起数百个板升村落。他们为了与口外的蒙古族融洽相处，纷纷给自己取了蒙古名字。史书记载，阿勒坦汗颇为重用的汉人头目赵全、李自罄、赵龙、刘天麟等人，或有自己的蒙古名，或是为子女取了蒙古名。如李自罄的蒙古名为巴哈毕斜气，赵全为女儿取蒙古名簿合图，赵龙的六个儿子均有蒙古语名字，分别是火泥计、窝兔、瓦拜兔、瓦十兔、簿合兔、宁安兔。

清朝建立后，蒙禁政策日渐松弛，大量晋、陕汉族移民“走西口”迁徙到塞外。汉族移民和蒙古族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结下深厚友谊，许多人开始“习蒙俗、说蒙话、取蒙名”，土右旗汉族群众至今仍挂在嘴边的习语“走胡地，随胡礼”说的就是这种现象。如“台



敕勒川民居中具有农耕文化特点的“炕围画”由走西口先民带来